

# 艰难的演进

——抗战相持阶段国军的编制嬗变(1939—1944)

陈 默

**内容提要** 国军部队的编制是决定其战斗力的一个重要因素。1939年初至1945年初为抗战的相持阶段,这一时期的国军在对日作战的同时,对部队编制不断进行着调整。1938年底确定的廿七年编制在推广过程中出现了“打折扣”和“缩水”的状况,迫使国军另起炉灶,酝酿新的卅年编制,并在小范围内试行。由该编制发展而来的卅一年编制更符合当时国军的实际,最终成为相持阶段国军部队广泛采用的编制。相持阶段国军编制艰难演进的过程,既体现了国军在部队编制制订上逐渐趋于实际的取向,又反映了战争条件下国军所遭遇的越发严重的困境。

**关键词** 相持阶段 国军 编制嬗变

1944年初,持续近七年的抗日战争在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下,似乎迎来了一丝胜利的曙光。2月3日,蒋介石离开重庆前往桂林、衡阳等地,筹划反攻作战。<sup>①</sup>2月10日,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召开,蒋介石面对第三、四、六、七、九战区的高级将领们,宣布这是“我们预备反攻,争取最后胜利的一次会议”。会上,蒋介石不断给在座将领们做精神动员,认为反攻的时机已经成熟,然而他对于国民党军(以下简称“国军”)当下的战斗力忧心忡忡。他说:“敌人在我国境内的不过六个军,而我们用以抗战的有一百廿个军,以二十个军来对敌人一个军,还打不过敌人,还要常常受敌人的打击。”<sup>②</sup>

尽管如此,蒋介石仍然做出了在五六月间展开反攻的部署。但是,这一年4月日军开始的一号作战完全破坏了蒋介石的反攻计划,也使得抗战的相持阶段从1939年初延续到了1945

<sup>①</sup> 参见《蒋介石日记》(手稿),1944年2月3—9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下同。

<sup>②</sup> 蒋介石:《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开会训词》(1944年2月10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0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321、325页。

年初。<sup>①</sup>在这次中方称为“豫湘桂会战”的连续作战中,国军乏弱的战斗力充分地暴露出来,中外舆论为之哗然。

在导致国军战斗力如此低下的多个要素中,部队编制是相当重要的一个。1944年6月1日,陈诚在致军政部长林蔚的电报中明确表示,此次中原会战的失利,重要原因是“国军现行战斗序列,单位复杂,松懈无力,指挥不便,协同尤难”。<sup>②</sup>上述几点与部队编制直接相关。7月21日,在重庆黄山召开的整军预备会议上,蒋介石指出部队需要改进的三个问题中,第一个是“关于军队的编制与经费,应该加以切实的检讨”。7月27日,蒋介石在正式的整军会议中更加痛心疾首:“目前我们军队番号众多,而编制不实,员额不足,粮饷浩繁而空额过半,弊病丛生,种种不合理的情形,真是亡国的现象。唯一补救的办法,就是减少大单位,充实小单位,以求兵员编制与粮饷装备之核实有效。”<sup>③</sup>由此可知,当时国军的编制确实存在着相当多的问题亟待解决。

有意思的是,此时国军部队绝大多数已在两年前(1942年)按照《陆军各部队调整大纲》实施了改编,所使用的卅一年编制<sup>④</sup>既非战前的陈旧设计,又非战时的急就文章,而是国军高层深思熟虑后的产物。回顾自1939年初相持阶段开始以来国军整理部队的历程,可以发现几年来国军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始终没有停止对军队的调整,特别是在部队编制方面还颇下了不少工夫,在既有的廿七年编制基础上陆续发展出卅年和卅一年两套编制,用于战略单位的整理和改编。<sup>⑤</sup>

为什么精心设计的新编制仍问题重重,无法适应当时的战局?部队编制从廿七年编制演进至卅一年编制,人力、火力等配备水平,究竟是提升了还是下降了?新的编制不断被设计出来,其实际的推行情况如何?上述问题都有赖于相持阶段国军编制嬗变的历程之梳理,才有可能得到基于史实的解释。目前,学界关于抗战相持阶段的研究已相对充分,但仍多集中在战争本身,对于战时国军的整理特别是部队编制的变迁仍关注得较为有限。<sup>⑥</sup>笔者主要依据各类原始资料,参照时人的回忆,力求复原抗战相持阶段国军野战军、师在整理过程中编制的嬗变,考察其由初期的廿七年编

<sup>①</sup> 关于抗日战争之分期,学界存在争议。最初学者们多倾向于沿用当时人的观点,即陈诚、何应钦所认为的八年抗战两阶段论,认为抗战仅存在第一期和第二期两个阶段,以武汉沦陷为分界点,并无反攻阶段。参见陈诚《八年抗战的经过概要》,国防部史料局1946年版;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中国陆军总司令部1946年版。20世纪90年代以来,海峡两岸的学者不约而同地将八年抗战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将过去的第二期以太平洋战争爆发为界,划为两个阶段,而过去的第一期为第一阶段。在第三个阶段,学者逐渐倾向于认为太平洋战争后战局逐渐不利于日方,而中国战场逐渐出现了反攻之势。参见“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国民革命建军史》第3部,“八年抗战与戡乱”(1),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93年版,第1001—1003页;曾景忠:《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研究述评》,《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3期,第87页;郭汝瑰、黄玉顺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7—58页。目前,学界比较接受这样的观点:太平洋战争后的正面战场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但相持阶段的结束时间应为1945年春夏之交,即湘西会战开始之时。参见苏盾、杨静《再论中国战场的战略反攻》,《安徽史学》1997年第4期;李继华:《也谈抗日战争的阶段划分》,《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2期;崔义中、赵鹏:《抗日战争应为五个阶段》,《人文杂志》2008年第4期。

<sup>②</sup> 陈诚:《电林蔚告以全盘调整战斗序列意见备参考》(1944年6月1日),何智霖编:《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下册,台北,“国史馆”2007年版,第242页。

<sup>③</sup> 蒋介石:《对于整军会议之训示——知耻图强》(1944年7月21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0卷,第452页;蒋介石:《对于整军各案之训示》(1944年7月27日、28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0卷,第456—457页。

<sup>④</sup> 卅一年编制亦称三十一年编制,当时文献对于年度之使用,存在“廿七年”、“二十七年”,“卅年”、“三十年”,“卅一年”、“三十一年”两类表述,本文除引文外,均使用前一种表述,即“廿七年”、“卅年”、“卅一年”。

<sup>⑤</sup> 战略单位是“具备统帅、经理、卫生各机关连[联]合各兵种,能于数日间独立作战之建制部队,每日可依其长官之直接命令而进退之最大单位”。参见《军语释要》,训练总监部1929年编印,第12页。战前国军的战略单位是师,1938年之后,国军将战略单位正式确定为军。

<sup>⑥</sup> 学界关于此问题的研究状况,参见陈默《抗战初期的国军整理:部队的整补扩充和新编制的形成(1937—1938)》,《抗日战争研究》2013年第1期,第20—21页。

制过渡至后期的卅一年编制的发展轨迹,以解答前述几个问题;同时,希望从编制变化出发,了解此间部队编制与军队状况、部队编制与军队战斗力之间复杂的关系。

### 一、“打折扣”和“缩水”:廿七年编制的实际编成

抗战初期一年多的战事证明,国军在战前所采用的调整师、整理师等编制不适于抗战局势的发展变化。为了扭转这种不利局面,1938年2月和7月国军分别试行了两套编制,用以改编部分野战军、师,并一举废除过去以师为战略单位的传统,确定以军为战略单位。经过数月讨论,在1938年12月的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上,廿七年新编制得以确立,并计划在全体国军部队中推广。

廿七年编制以军为战略单位,师一级编制改旧有的两旅四团制为三团制,是一种全新的编制,从设计理念到实际配备都明显强于之前的各种编制。按照军政部的设想,国军部队按照廿七年编制改编,再将兵员、械弹补充,人事、经理统一后,与日军同级的师团相比,国军的战略单位——军,在兵力和火力上均具有优势。廿七年编制的具体配备概如表1:

表1 廿七年军编制表

军属基本部队	军直属特种兵科	师属部队	团属部队	营属部队	连属部队	排属部队	班构成
步兵师3	炮、骑各1团,工、辎、通、特各1营	步团3,迫击炮、工、辎各1营,骑、通、战车防御炮、特各1连	步营3,通1排	步连3,机枪1连,迫击炮1排	步排3	步班3,附掷弹筒3门	轻机枪组1,步枪兵8

资料来源:《陆军师暂行编制表》(1938年1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787/02580,第43页;《陆军甲种军系统表》(1939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787/00575,第155页。

此后的1939年至1941年,利用战局进入相持阶段的有利时机,国军对全体野战军、师进行了著名的四期整训。整训的首要内容就是用新的廿七年编制对部队进行整编。按照最初的计划,全部战略单位都将采用新编制改编,但至1941年底整训结束时,实际上只有2/3的军、师进行了改编,剩下1/3的部队仍然保持着战争初期的编制。更关键的是,按照廿七年编制改编的部队,其质量并未因之而提升,各军各师的战斗力较之过去并没有显著改观,这实在颇具诡论意味,其原因主要在于廿七年编制在实际推行中出现了问题。

必须承认,这四期整训后国军部队的编制确实发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首先,经过几年的整训后,廿七年编制推广至近200个师,这是国军部队编制发展史上不曾出现过的整齐划一。其次,廿七年编制在其推行过程中不断得到因时制宜的改进,少数部队的实际编成较1938年底订立的编制表还要完备一些。<sup>①</sup>

可是,廿七年编制实际推行中产生的消极影响,远远超过了前述这些变化产生的积极意义。这些消极影响产生的直接后果,就包括1939年国军“冬季攻势”的失利——第一、二期整训后按照廿

<sup>①</sup> 譬如1939年在桂林行营召开的整补会议上,各部纷纷提出对廿七年编制的改进意见。这些意见首先指向过去军、师司令部功能不健全、人员过少的问题,希望增设参谋、军械人员。会议之后,部分军、师的司令部编制就因之得以扩充,廿七年师司令部参谋处下属仅设三科,后来即增加了主管人事的第四科,专司官佐任免、铨叙、兵员拨补事宜。参见《桂林行营整补会议编制案》(194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787/02606,第168—184页;《陆军第一预备师三十年六月份参谋长定期报告关于参谋人事及参谋教育部分》(1941年6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787/02512,第163—164页。

七年编制改编的66个军、171个师<sup>①</sup>中的相当一部分对日军展开反击,却未能取得预期战果。根据日方材料,国军“用了约七十一个师的兵力却未收复尺寸土地,而且受到很大打击”。<sup>②</sup>蒋介石在总结“冬季攻势”时哀叹:“我军的质量与敌军质量比较起来,有一个很危险的现象。”他告诉各部队参谋长,战争初期国军三个师可以对抗日军一个师团,徐州会战时五六个师才能打败日军一个师团,到“冬季攻势”时“我们现在以十个师几乎还打不过他一个师团!”<sup>③</sup>

正如蒋介石所发现的,整训后采用廿七年编制改编的部队,质量并未得到提升。后来的研究者在论及此役时则更加敏锐地指出:这缘于国军整训的实施过程中,囿于客观条件而未能把整训计划落到实处。<sup>④</sup>分析四期整训中各个军、师按照廿七年编制改编的具体过程,可见廿七年编制在野战军、师的推广过程中普遍存在着两大问题:一个是部队的实际编成相对于编制表存在着“打折扣”现象,另一个是部队的枪炮器械之配备一再出现“缩水”的情况。

1939年初第一期整训伊始,“打折扣”的现象便出现了——部队在按照廿七年编制改编时,军政部规定的配置标准相对于1938年底颁布的编制表打了折扣。对比参加第一期整训各部队所实施的廿七年编制与1938年底订立的廿七年编制表,不难发现编制表中的不少单位被“打折扣”处理:原军属骑兵团被缩减为连甚至排,原军属炮兵团缩减为营,原师属骑兵连缩减为排,最关键的是相当多的原定装备山炮或野炮的军属炮兵营明确改定为迫击炮(以下简称“迫炮”)营,这实在是一个相当大的折扣。按照军政部军务司的统计,在第一期整训的近100个师中,仅有8个师的师属炮兵营补充了火炮完成了改编,13个师编有炮兵营(连)但缺乏火炮补充,剩余的大多数师只得陆续成立迫炮营。<sup>⑤</sup>作为军属、师属支援火力的75毫米山炮或野炮被82毫米迫炮代替,其射程缩小了2/3,威力减小了1/2,精度更是下降了一个数量级,这对战场火力强弱的影响不言而喻。

之后的第二、三、四期整训中,军政部在给参加整训的军、师下达改编标准时,也和第一期整训类似,均在廿七年编制表的基础上不同程度地打了折扣。一般来说,军属特种兵科均比编制表的设置降了一档,其中骑兵部队下降得最为厉害,基本上无法兑现骑兵团的建制;师属特种兵同样降了档次,最为重要的炮兵营多被迫炮营代替,其原有的山、野炮一律呈缴;编制表中增设的师属战车防御炮(以下简称“战防炮”)营,在现实中因为缺乏反坦克炮而缺编。<sup>⑥</sup>

就连这些在编制表上打了折扣的改编标准,大多数的军及其所辖的各师,也无法保证按此完成改编。军政部在1939年上半年的校阅各部队的报告中指出:“各部队多有未照编制完全组成,如师属骑兵连、炮兵营均阙如,战时增设部队间有尚未成立。”<sup>⑦</sup>胡宗南的第一军是老资格的蒋介石嫡系部队,在按照廿七年编制改编时,其实际编成的军属特种兵科,也只是“增编工、通、辎、特四直属营

<sup>①</sup> 第一期整训中的35个军部93个师、第二期整训的31个军部78个师均按照廿七年编制改编。参见何应钦《何应钦呈第一期整理部队经过情形及第二期整理拟暂缓》(1939年5月16日)、军令部:《第二期整训部队编成整训地点及时限一览表》(1939年6月2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102/00069/004,第38、54页。

<sup>②</sup>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田琪之译:《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1分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3页。

<sup>③</sup> 蒋介石:《参谋长会议训词(二)》(1940年3月7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7卷,第128—129页。

<sup>④</sup> Hsi-sheng Ch'i,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 1937—1945*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2), p. 59.

<sup>⑤</sup> 军务司:《军务司呈奉批整编各部炮兵报告各点遵办情形检查表》(1939年3月1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102/00069/005,第79页。

<sup>⑥</sup> 参见《第二期军委会直辖整训部队实施办法》(1939年7月)、《第三期军委会直辖整训部队实施办法》(1939年12月)、《第四期整训部队实施办法》(1940年11月13日),何智霖编:《陈诚先生从军史料选辑——整军纪要》,台北,“国史馆”2010年版,第125—127、140—142、145—147、151—158页。

<sup>⑦</sup> 《民国二十八年上期总校阅各受校部队一般缺点及改进意见表》(1939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787/02506,第36页。

及两野战补充团”，并没有骑、炮团的建制，直到1941年4月参加第四期整训时，其军属特种兵科才达到改编标准的要求。<sup>①</sup>非嫡系部队的情况自然更加糟糕，川军杨森的第二十军，在1940年1月被列入第三期整训计划，名义上是按照廿七年甲种军编制编成，但实际编成的军直属部队仅仅是“直属通信兵营、特务连、徒步骑兵连、辎重兵团、军乐队、野战医院、野战补充团各一”，工、骑、炮等建制均没有实际编成，第二十军所辖各师的情况也与之相似。<sup>②</sup>预备第三师于1939年9月初建时，其战防炮连、炮兵营均未成立，直到12月才奉令成立师战防炮连。由于反坦克炮迟迟未及拨发，该连直到1940年9月才告编竣。师炮兵营即便以迫炮营替代，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迟至1940年1月方才编成。<sup>③</sup>

恰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军委会”）1941年的一份报告中所言：“就实际情况观察，廿七年编制之骑兵团、炮兵团，因马炮缺乏，多半未能成立，辎重营亦因缺乏骡马及汽车，甚少编足者，而各部队规定数目之乘马，实际多属乌有，补充亦恐不易。”<sup>④</sup>至四期整训完毕，除少数几个得到特别关照的军，国军序列中大多数军、师的实际编制距离廿七年编制表有着不小的差距。无怪完成整训后统一为廿七年编制的近200个师，对付日军的20多个师团仍力不从心，其首要原因恐怕就在于理论上还算健全的编制，但在实际推行中被一再“打折扣”处理。

更大的问题在于，即便在已然“折后再折”的实际编成中，各级单位的武器弹药也未能得到足够的配备，纷纷呈现“缩水”的状况。第一期整训结束时，何应钦在报告中陈明属于军委会直辖整训的部队，有部分军、师因交通不便未能领到械弹；而属于战区直辖整训的部队，“因械弹器材来源缺乏，尚未补充”。<sup>⑤</sup>第二期整训结束之后的五届六中全会上，何应钦汇报称：“惟因广州海口被敌封锁后，外货来源不易，多数军需品，均须本国自制，现在制造力量，尚未充分，未能适应预期之要求；更以战区交通困难，运输迟缓，故战区整理部队之补充，缺点尚多，正力图设法补救，陆续补充。”<sup>⑥</sup>可见，第一、二期整训时参加整训的部队，其装备未能足额发放。

至第三、四期整训时，外国武器援助只有依靠苏联通过陆路运输，国军武器弹药来源日益陷入困境。何应钦在1940年3月全国军以上参谋长会议中，提醒与会各部参谋长：“最近曾有电报指示各部队爱惜子弹，当然是因为一、国外购买不便，二、国内制造有限……各位今后应体念来源的困难、制造的不易，勉励部下爱惜弹药，不要浪费。”<sup>⑦</sup>可见，第三、四期整训期间，据廿七年编制改编的各军各师，其装备补充较之前更为艰难。

这一阶段野战军、师的装备情况自然与此窘境吻合。第一期整训部队中，大多数师的轻武器数量就存在相当程度的不足。按照“打折扣”后的编制，1个师的步枪数为2500支、轻机枪数为172挺、重机枪数54挺、迫炮数18门，而陈明仁的预备第二师、何绍周第一〇三师、丁治磐第四十一师

① 《第一军简史》（1942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787/16780，第4—5页。

② 《陆军第二十军历史概要》（1945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787/16784，第4页。按，所谓徒步骑兵连，乃是一些部队编成了骑兵连的单位，但由于缺乏乘马，所有的骑兵只得徒步执行任务，故被称为徒步骑兵连。

③ 参见《陆军第三预备师整编经过》（1940年4月1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787/02596，第3—4页。

④ 侯成：《三十年陆军军师编制审查报告书》（1941年），何智霖编：《陈诚先生书信集——与友人书》上册，台北，“国史馆”2009年版，第189页。

⑤ 何应钦：《何应钦呈第一期整理部队经过情形及第二期整理拟暂缓》（1939年5月16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102/00069/004，第38—39页。

⑥ 何应钦：《对五届六中全会军事报告（自民国廿八年一月至民国廿八年十月）》，浙江省历史学会现代史资料组编：《抗日战争军事报告集》（上），杭州出版社1985年版，第187页。

⑦ 何应钦：《何总长出席参谋长会议训示》（1940年3月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787/02482，第48—49页；“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国民革命建军史》第3部，“八年抗战与戡乱”（2），第1317页。

的步枪数分别为1162、1757、882,轻机枪为71、98、150,重机枪为0、16、0,迫炮为0、10、0,其配备之不足可见一斑。军政部对其进行了补充,但也未能补足,只得先补足欠额的一半。<sup>①</sup>后来的几期整训中,部分军、师的械弹配备情况逐渐有所好转,但仍没有实现足额配备。<sup>②</sup>

部队所配备的枪炮不仅在数量上不足,其质量也令人担忧。1939年9月,军委会点验委员会在点验第八十九师时,发现其装备了207挺轻机枪,就数量而言还算得上充足甚至富余,但其中不少已经属于“有使用年限久已失效能者”。<sup>③</sup>1941年6月,第一〇七师报告:该师实有步枪2362支,但其中“内有旧汉式步枪六三零枝〔支〕,未领到之比造步枪四四二枝〔支〕”,可见老旧的“汉阳造”仍占有较高比例,而新购的比利时造步枪却得不到补充,制约了这个师的步兵基础火力的发挥。<sup>④</sup>

其实早在战前,每每有新的编制颁行,按照该编制改编的各师,均存在特种兵科不能配齐的情况,而枪炮弹药也多未能充足配备,唯一的例外是1936年强化配备的20个“调整师”。<sup>⑤</sup>无奈的是,此类弊病令人遗憾地延续到抗战,并在廿七年编制的推广过程中更是如此。这样一个理论上较为成熟完备的新编制方案在推广过程中,其配备标准一再被“打折扣”,且很多部队连“打折扣”后的标准都达不到;各军各师的枪炮弹药等装备本来就配备不足,其质量更是陈旧低劣,呈现“缩水”的样态。粗略估算,第四期整训之后按照所谓的廿七年编制改编的近200个师,其实力恐怕不及其预设的百分之六七十。此外,还有近100个师未参加整训,仍旧保持着战前的“整理师”等旧式编制,它们的配置更为陈旧简陋;由这些师组成的数十个军,其军直属部队也多付诸阙如。上述部队的实力较“打折扣”和“缩水”的廿七年制军、师还要薄弱。

## 二、另起炉灶:卅年编制的酝酿和试行

廿七年编制本身并非一个草草创就的编制方案,它的制订出台几经反复,臻于完善后才正式出炉。可惜在实际改编中,所谓按照新编制编成的国军军、师,其实际配备却是“折后再折”,而武器装备又逢“缩水”窘境。因此,按照这个编制改编而成的所谓廿七年制军、师,其综合实力尤其是战斗力,与编制表所设定的水平相差甚远。这恐怕是国军高层始料未及却又不得不痛苦面对的现实。针对此种实际情况,国军统帅部逐渐选择了另起炉灶,开始酝酿一套更贴近实际情况的新编制,用来代替施行不久的廿七年编制。

国军的另起炉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1939年廿七年编制开始推行之初,就有一些将领敏锐地觉察到编制落实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但他们首先想到的是采取“精兵主义”的策略,试图通过压缩部队规模来保证部队的质量,从而在全军推行廿七年编制。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在1939年撰文指出:本来就缺乏的军费“消耗于官兵薪饷者多,而应用于军事建设者少,以致各部队应有之武器装备器材,以及特种部队,尚未能依照编制定数,充实健全,遂至战时整理补充,亦不得不分期办理,以

<sup>①</sup> 何应钦:《拟补充第一期整训部队第二批十九个师主要武器数量表》(1939年2月1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102/00069/004,第59页。

<sup>②</sup> 参见《陆军暂编第五十一师二十九年度下半年参谋人员定期报告书》(1941年)、《陆军新编第十九师参谋长报告书》(1941年2月20日)、《陆军暂编第五十五师参谋长对部队现状报告书》(1941年6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787/02512,第53、80、102页。

<sup>③</sup> 《军委会点验委员会二十八年七月、九月份各组点验部队概况一览表》(1939年9月),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102/00083/006,第56页。

<sup>④</sup> 《陆军第七十军第一零七师参谋长三十年上期临时定期报告》(1941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787/02510,第19页。

<sup>⑤</sup> 参见陈默:《全面抗战前(1928—1937)国民党军队的编制演变》,《军事历史研究》2011年第3期,第64—72页。

谋经济之周转”，认为解决之道是“应采精兵主义，确定国防上必需之兵力，而将素质低劣各部队予以减少”。<sup>①</sup>

几乎与之同时，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提出应当切实缩减单位，以保证新编制的顺利落实。他在《建国与建军》一文中列举了之前国军各方面暴露的缺点，其中在编制方面，“单位数目过多，指挥级次太繁，致组织不能健全；各单位力量，参差不整，战斗力亦不能一致”，建议“大家就要彻底觉悟，务使一排一连，要有一排一连的实力，一营一团，要有一营一团的效能，否则宁可缩编归并，这样才能实现严格的新编制”。<sup>②</sup>

1939年至1941年，“缩军”虽是国军内部整军方案的主流思想，但同时订立一种新编制用于编练后方新军的新思路也已出现。1939年初陆军大学第十三期毕业生陈瑜，提出在后方新建30个师的建议，而在编制上新建军、师将采用新的编制。他针对既有编制人员过多而火力不足，“肉弹究挡不了飞机和大炮”的问题，提出了一套加强部队机动特别是强化火力配置的编制设想：每军辖2个步兵师，每个步兵师以1个三团制的步兵旅作为基干，师直辖1个营级搜索队、1个四营制的炮兵团、1个三连制的野战重炮兵营、1个三营制的工兵团、1个三连制的通信兵营、1个三营制的交通兵团，此外还编有瓦斯营、高射炮营、轻战车连、战防炮营和架桥纵列。这个编制设想最大的特点是所谓“大炮兵主义”——步兵营编有小炮排、迫炮排，步兵团编有轻榴弹炮连、战防炮连，而师属火炮达到了夸张的程度：共计编有36门75毫米野炮、12门150毫米轻榴弹炮、8门150毫米榴弹炮、4门100毫米加农炮。陈瑜坦言尽管此种设计弹药消耗惊人且炮兵编成不易，但这是出于“战斗之需要”，若炮火不足，“步兵须以自力前进，如是仍踏肉弹主义之覆辙”。<sup>③</sup>

倘若是发达的工业国如美、德、英、法，上述方案还可能被接受，但如此“前卫”的设想放在当时的日本陆军，都难以实现，遑论军费、武器装备严重不足的中国。这套方案自然不了了之，然而放弃廿七年编制、制订新编制的取向却逐渐被国军将领们接受。他们开始认真考虑制订一套新的编制，并围绕编制方案展开讨论，最后在此基础上编订了卅年编制。

1940年8月，时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正式提出了放弃廿七年编制的建议。他认为廿七年编制不仅落实情况不佳，其设计本身就存在巨大问题，按照此编制改编的部队战斗力自然薄弱，往往一个军无力和日军一个联队对抗，这是因为部队中的“非战斗员兵，超过战斗员兵”，1个近万人编制的师，步枪兵仅2000人，“战斗稍微激烈，仅一二日间各部战力即消失殆尽”，剩下的非战斗兵溃退，则“影响部队作战成绩为部队之重累”；同时“上级指挥机关及非战斗单位过多，而团以下之战列部队不能充实，形成头重足轻之现象”。陈诚上述关于廿七年编制的批评，确实不无道理，得到了不少人的赞同。<sup>④</sup>

不过，陈诚自己的全新编制方案，却引发了巨大的争议。陈诚设想在军、师之间恢复旅的建制，同时废除班的建制，以排为最小作战单位；1个排编有32人，辖1个轻机枪组（6人），2个步枪组（13人），较原来的排在人数方面要少很多，但又多于过去的1个步兵班；各级单位的队部均

① 何应钦：《建军的前提》，《黄埔季刊》第1卷第2期，1939年，第甲31页。

② 陈诚：《建国与建军》，《黄埔季刊》第1卷第3期，1939年，第3—5页。

③ 陈瑜：《建军的商榷》，《黄埔季刊》第1卷第1期，1939年，第7页、附表。按，“架桥纵列”，具体不详，估计为负责搭建便桥的连排级小部队，这样的单位曾经出现在1938年10月苏联顾问拟具的师编制方案中。参见《总顾问拟中华民国步兵师编制团》（1938年10月1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102/00067/008，第146页。

④ 参见《商震、姚琮呈军委会各部对改订国军编制案意见提要》（1940年10月2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200/00526/050，第101页。按，“战列部队”，接近军制学中的“战斗单位”的概念，是战场上依照指挥官的命令进行作战的小单位，如步兵连、骑兵连、炮兵连等。参见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编《军制学教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931年编印，第25页。

按过去下级队部改编,营部按连部改编,连部按排部改编,以此类推。如此设计的确削减了机关人员,提高以步枪兵为主的战斗兵比重,总体增加了军、师的作战人员数量。然而,军委会各部经过讨论,认为陈诚的编制方案虽然可以提高军官指挥能力,节省炮兵及重机枪等武器,但弊端更大:增加步枪兵并不能提升部队的作战能力,增加中间单位则会影响指挥、后勤和训练,削弱了火炮、机枪将导致支援火力缺乏,且短时间也无法训练足够多的官佐充实到中间单位。不少将领认为陈诚的这个方案“利少害多,难于实行”。<sup>①</sup>该方案过于标新立异,以致脱离实际,最终未能通过。

陈诚的方案虽被否定,但军政部参酌他的意见,选择了基于廿七年编制的设计原则订立新编制的路线,这无疑更加稳妥可行。1941年4月15日,军委会最高幕僚会议第20次会议上,军政部提出《为另订卅年军师暂行编制表及其加强办法案》,会议指令军委会相关部门对此进行讨论。<sup>②</sup>军委会办公厅会同军令、军政、军训、后勤四部要员开会审议之后,确定了新编制的3项原则:1.“仍以军为战略单位”;2.步兵师“概须完备最低标准之防御力量”;3.作战地形以山地为主。<sup>③</sup>新的编制将以卅年编制命名,而其架构也将有别于廿七年编制的设计。

卅年编制分为“加强”“普通”两种。卅年“加强”编制和廿七年编制基本架构相同,但配置上存在明显的缩减:原军属骑兵团被缩编为骑兵连(无马则称搜索连),原军属炮兵团缩编为炮兵营,军、师属辎重营改为两连制(人力、兽力各1连),营属各迫炮排合并为团属迫炮连,步兵连增编掷弹筒组,其余单位则延续了廿七年编制的设置。卅年“普通”编制较之“加强”编制则进一步缩减,军属特种兵科仅剩1个特务连,师属战防炮连、卫生队裁编,工、通、辎均设定为连级单位,步兵团、营也不设迫炮单位。<sup>④</sup>

廿七年编制与卅年两种编制的具体对比如表2(见下页)。

通过对比不难发现,卅年两种编制和廿七年编制存在很多相似,但在具体配备上缩减不少。尽管如此,参与讨论的军委会各部门人员,仍然认为卅年编制较廿七年编制“优点甚多”:减少了不必要的人马装备,必要的人马及火力“亦有加强之处”,能“维持相当之战斗力”;非战斗人员及马匹裁撤,“节省公帑”;多余的人马则“尽可调拨充实他部,化无用为有用”。关键在于,此编制方案“合乎现时国军大部分部队实际状况之需要”<sup>⑤</sup>,当时军费状况和物资条件足以让多数的军、师按照这个标准完成改编。因而,1941年7月,卅年编制正式得以通过,拟通令实施。<sup>⑥</sup>8月,陈诚收到关于此编制的审查报告书后,也对这个编制方案表示支持。<sup>⑦</sup>

遗憾的是,卅年两种编制虽然被统帅部接受,但事实上该编制仅在极少数军、师得到试行,并未成为一个通行的编制在国军内部全面推广,且试行的少数军、师,也未完全按照编制表进行改编。

<sup>①</sup> 参见《商震、姚琮呈军委会各部对改订国军编制案意见提要》(1940年10月2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200/00526/050,第103、100页。

<sup>②</sup> 《最高幕僚会议第二十次会议记录》(1941年4月1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787/02472,第535—536页。按,最高幕僚会议是战时军委会所属各部、会的联席会议,不定期召开,各部、会提出各种计划、方案,在会议上充分讨论,最终形成会议决议,由相关单位或个人实施。

<sup>③</sup> 侯成:《三十年陆军军师编制审查报告书》(1941年),何智霖编:《陈诚先生书信集——与友人书》上册,第188—189页。

<sup>④</sup> 《三十年军师编制与二十七年军事编制编成概况比较表》(1941年),何智霖编:《陈诚先生书信集——与友人书》上册,第193页。

<sup>⑤</sup> 侯成:《三十年陆军军师编制审查报告书》(1941年),何智霖编:《陈诚先生书信集——与友人书》上册,第188—192页。

<sup>⑥</sup> 何应钦:《军政十五年》,台北,何应钦上将九五诞辰丛书编辑委员会1984年版,第50页。

<sup>⑦</sup> 陈诚:《函侯成略述调整军师编制意见》(1941年8月),台北,“国史馆”藏,陈诚副总统文物档案,008/010101/00003/148,第1页。



如第十八军和该军所辖的第十一师,在1941年即奉令按照《卅年陆军加强编制表》进行改编,但在军、师两级的具体配置上,与编制表并非完全一致。<sup>①</sup>类似的还有新编第三十九师,该师于同年11月奉令改编为卅年加强师,但在裁撤原有的野战补充团时,将工兵营和辎重营裁撤。<sup>②</sup>这显然与卅年加强编制表不符。

表2 廿七年编制、卅年加强编制、卅年普通编制对比表

编制 配 备	廿七年编制	卅年加强编制	卅年普通编制
军属基本部队	步兵师3	步兵师3	步兵师3
军直属特种兵种	炮、骑各1团,工、辎、通、特各1营	炮、工、通、辎、特各1营,骑1连	特1连
师属部队	步团3,迫炮、工、辎各1营,骑、通、战防炮、特各1连	步团3,迫炮、工、辎各1营,骑、通、战防炮、特各1连	步团3,迫炮1营,骑、工、通、辎、特各1连
团属部队	步营3,通1排	步营3,迫炮1连,通1排	步营3,通1排
营属部队	步连3,机枪1连,迫炮1排	步连3,机枪1连	步连3,机枪1连
连属部队	步排3	步排3	步排3
排属部队	步班3,附掷弹筒3门	步班3,掷弹筒组1或2门	步班3,掷弹筒组1或2门
班构成	轻机枪组1,步枪兵8	轻机枪组1,步枪兵8	轻机枪组1,步枪兵8

资料来源:《三十年军师编制与二十七年军事编制编成概况比较表》,何智霖编:《陈诚先生书信集——与友人书》上册,第193页。

卅年编制之所以未能迅速全面铺开,大概与1941年下半年国军高层内部关于“缩军”的论争有关。1941年9月出台的《陆军各部队调整大纲》是压缩部队的纲领性文件,其对编制的规定是“素质优良战功昭著及原已按照二十七年编制整编者,用三十年加强编制;素质较差战功较次者,用三十年暂行编制”。<sup>③</sup>但此时国军高层内部尚未统一“缩军”的思想,白崇禧、陈诚、徐永昌等人围绕这个问题争论不休,而蒋介石本人则犹豫不决。12月,蒋介石决心以此“调整大纲”调整军、师编制时,民国卅年(1941年)已临近结束。1942年春,国军各军、师改编时使用的新编制,已经是在卅年编制基础上进一步调整而成的卅一年编制。

### 三、成败难言:卅一年编制的全面推广

1942年1月21日,第二十六军军长丁治磐接到军政部命令,要求该军按照卅一年加强编制改编,并于月底改编完竣。<sup>④</sup>1941年底,顾祝同的第三战区所属部队也接到相似的命令,除了第十八军和暂编第九军按照卅一年一般编制改编外,其余各军、师都按照加强编制改编,全战区在1942年2月底就完成了改编。<sup>⑤</sup>据军政部军务司司长王文宣的报告:1942年1—7月,共计72个军202

① 参见《陆军第十八军整训概述》(1942年4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787/02496,第23页;《陆军第十八军第十一师三十四年度参谋长报告书(作战部分)》(1945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787/02516,第38页。

② 《陆军第三十九师概况》(1943年8月11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一般档案,501/171,第1页。

③ 《陆军各部队调整大纲》(1941年9月),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102/00069/007,第105页。

④ 丁治磐:《丁治磐日记》第3册,1942年1月21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版,第109页。

⑤ 顾祝同:《墨三十九自述》,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1年版,第222页。

个师按照卅一年加强编制调整,其余20个军43个师按照卅一年一般编制调整。<sup>①</sup>至此,国军各军、师在半年内统一按照卅一年编制改编,这是战时国军整军中的一件大事。

由卅年编制发展而来的卅一年编制,更加贴近当时国军的客观状况。编制的设计与部队的实情大致吻合,改变了长期以来“编制表是编制表,编制是编制”的情况。该编制的大范围推广,使得国军部队在组织架构上基本实现了期盼已久的整齐划一。这是国军推行卅一年编制取得的最大成就。然而,这个编制方案以及按照这个方案进行的改编,对于提升国军作战能力方面并未做出太多贡献,战斗力乏弱的卅一年制军、师在1944年的豫湘桂会战中,纷纷无力抵挡日军攻势而败下阵来。这是该编制方案给国军带来的最大遗憾。因此,卅一年编制对于国军而言,到底是一剂良药还是一个失着,还真是一言难尽。尽管如此,卅一年编制并未被废止,而是在1944年得到了修正并继续沿用至相持阶段结束。

1942年初,国军统帅部在《陆军各部队调整大纲》的基础上颁布其“实施办法”,决定分两期整理国军各军、师。在编制方面,将原定的卅年编制“改定《三十一年陆军军师编制表》颁发施行”。<sup>②</sup>其中,第一期主要整理已经参加过前面四期整训并按照廿七年编制改编的军、师,采用卅一年加强编制进行改编;第二期则重点整理此前没有按照廿七年编制整理的军、师,所采用的是卅一年一般编制。

就编制本身而言,卅一年加强编制在卅年加强编制基础上进行了一些结构调整。各师辎重兵营收归军部直属,军属辎重兵营也因之扩展为团;各师野战医院的调整方法与之类似,也收归军部直属,军野战医院因而由1个扩展为3个;军属骑兵连因为普遍缺乏军马,统一改为军搜索连。此外其余单位均与卅年编制保持一致。相对于廿七年编制,军部多设军务、军法两处,其职能更为健全。<sup>③</sup>在师一级,除师属辎重兵、野战医院的建制裁撤外,有两个较为重要的缩减:师属特种兵科中最为重要的迫炮营遭到撤销,而师属工兵营也被压缩为工兵连,此外其余单位得以保留。<sup>④</sup>这样的设置方案,其本质就是将师原有的部分特种兵科上调至军一级直属队编制。

卅一年一般编制与卅年一般编制相比,其军属特种兵科得以最低限度地配齐,但师属各级单位仍旧简化设置。卅一年一般编制军以辖3个师为原则,但两师制军仍暂时保留。其军属特种兵科中,搜索连由原骑兵排扩编;辎重兵营由原军、师辎重兵连合编;原设有特务团、营的军保留其建制,原无特务单位的按编制成立特务连;通信连由原通信连及无线电排合并,若原无通信单位的军新编成一连;需要强调的是,军属炮兵、工兵部队仍旧缺编。师一级的特种兵科与卅一年一般编制师基本一致,区别在于作用巨大的师属迫炮营未能进入编制;师所属步兵团、营亦略有缩减,其步兵营直属的机枪连缺编。<sup>⑤</sup>

卅年两种编制和卅一年两种编制具体对比见表3:

<sup>①</sup> 王文宣:《最近十年军务纪要节选(1933—1943)》,《民国档案》1989年第1期,第58页。

<sup>②</sup> 何应钦:《对五届十中全会军事报告(自民国三十年十二月至民国三十一年十二月)》,浙江省历史学会现代史资料组编:《抗日战争军事报告集》(下),第133页。

<sup>③</sup> 卅一年加强军编制根据下列档案整理而成:《陆军第二十军历史概要》(1945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787/16784,第5页;《陆军第四十四军沿革略史》(1946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787/16787,第5页;《陆军第五十三军沿革详细历史》(1942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787/16789,第7页;《陆军第十四军三十四年度工作报告书》(1945年),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一般档案,501/185.1,第34页。

<sup>④</sup> 卅一年加强师编制根据下列档案及书刊整理而成:《陆军第六十军整训备战报告书》(1942年5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787/02608,第38页;《陆军第五十三军沿革详细历史》(1942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787/16789,第7页;《陆军第十八军第十一师三十四年度参谋长报告书(作战部分)》(1945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787/02516,第38页;陆军整编第六十二师第一五一旅编:《本师简史》,《陆军第一五一师三十周年纪念特刊》,陆军整编第六十二师第一五一旅1947年编印,第18页。

<sup>⑤</sup> 《陆军各部队调整实施办法》(1942年4月1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787/02603,第3—17页。

表3 卅年加强编制、卅年普通编制、卅一年加强编制、卅一年普通编制对比表

编制 配备	卅年加强编制	卅年普通编制	卅一年加强编制	卅一年普通编制
军属基本部队	步兵师3	步兵师3	步兵师3	步兵师3(或步兵师2)
军直属特种兵种	炮、工、通、辎、特各1营,骑1连	特1连	辎1团,炮、工、通、特各1营,搜1连	辎1营,搜、特、通1连
师属部队	步团3,迫炮、工、辎各1营,骑、通、战防炮、特各1连	步团3,迫炮1营,骑、工、通、辎、特各1连	步团3,工、骑、通、战防炮、特各1连	步团3,骑、工、通、辎、特各1连
团属部队	步营3,迫炮1连,通1排	步营3,通1排	步营3,迫炮1连,通1排	步营3,通1排
营属部队	步连3,机枪1连	步连3,机枪1连	步连3,机枪1连	步连3
连属部队	步排3	步排3	步排3	步排3
排属部队	步班3,掷弹筒组1或2门	步班3,掷弹筒组1或2门	步班3,掷弹筒组1或2门	步班3,掷弹筒组1或2门
班构成	轻机枪组1,步枪兵8	轻机枪组1,步枪兵8	轻机枪组1,步枪兵8	轻机枪组1,步枪兵8

资料来源:《三十年军师编制与二十七年军事编制概况比较表》,何智霖编:《陈诚先生书信集——与友人书》上册,第193页;《陆军第二十军历史概要》(1945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787/16784,第5页;《陆军第四十四军沿革略史》(1946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787/16787,第5页;《陆军第五十三军沿革详细历史》(1942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787/16789,第7页;《陆军第十四军三十四年度工作报告书》(1945年),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一般档案,501/185.1,第34页;《陆军第六十军整训备战报告书》(1942年5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787/02608,第38页;《陆军第十八军第十一师三十四年度参谋长报告书(作战部分)》(1945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787/02516,第38页;陆军整编第六十二师第一五一旅编:《本师简史》,《陆军第一五一师三十周年纪念特刊》,第18页。

由表3及前述表1、表2可知,从廿七年编制到卅年编制再到卅一年编制,国军在军、师两级的架构上已经发生了不小变化,且实际改编中大多数的军、师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完成了新编制的调整。改编进展得如此迅速,缘于各军、师的编制并未经历“伤筋动骨”的变化:过去廿七年编制中军属骑兵团、炮兵团在事实上大多仅仅编成营、连级单位,因而在改编中很多军的炮兵部队均保持原样不变,仅仅更换名称即可。改编过程中,大多数军仅仅是将各师及军属辎重兵营合编为军属辎重兵团,各师及军部医院合并为军属第一、二、三野战医院,并将各师的野战补充团裁撤,即告改编完成。

从客观效果来看,1942年初短短数月间多数军、师完成了编制转换,这对于军队的持续作战和恢复训练较为有利。如前所述,1939—1941年四期整训只完成了200余个师的廿七年制改编,尚存100多个师仍保留着战前的整理师编制。1942年上半年的这一次改编,用两种方案将绝大多数的军、师都统一在卅一年编制之下,将过去未能改编的部队按照新标准予以整齐划一,对于国军的制式化和正规化不无裨益,同时也是国军编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国军期盼已久的“编制统一梦”终于在此刻基本得以实现。

相对于卅年编制,卅一年编制的主要设计思路正如顾祝同所说的,“目的在于缩小师之单位,而加强军之单位,以增强战力”。<sup>①</sup>将火力和资源尽量集中至军一级,从而改变了以往编制方案中

① 顾祝同:《墨三九自述》,第222页。

“军、师并重”的特点,就学理而言,这样的设计自有其内在逻辑。首先,军作为战略单位,其直属单位理应更为齐备且得到强化;其次,在当时的物资条件下,军与师两级无法都得到强化,那么将重心放在军一级,也符合了“突出重点”这一基本原则。

蒋介石对于卅一年编制的设计思路较为满意。在全军完成改编之后的一次军事会议中,他详细讲解了此种编成的优点,归纳起来有五点:“在使战略指挥机关由复杂趋于单纯,系统由纷歧趋于整一;在谋补给线之简捷便当而省费;在求充实战略单位兵力,使我军实力胜过敌人;在求兵力运输与交通之便利快速;特种兵移归军部指挥,便于集中机动使用,更能发挥作战威力。”<sup>①</sup>在蒋介石看来,卅一年编制在指挥、后勤、火力、运输、作战等方面均优越于过去的编制。

事实上,卅一年编制并未实现蒋介石和顾祝同等人所希望的提高部队作战能力的目标。第一,就编制本身而论,卅一年加强编制相对于之前各类甲种编制(如调整师、廿七年编制),在配置上不但没有增强,相反还有减弱;而卅一年一般编制与之前乙种编制(廿四、廿六年整理师编制)比较,也没有多少实质的提升。以辎重兵为例,廿六年整理师编制中每师编有1个辎重连,则1个军可以拥有2个连甚至1个三连制营的辎重运力;而在卅一年加强编制中,1个军所直属的辎重兵,也就是1个营而已,数据上并未有所增加。又以炮兵为例,战前调整师每师直属1个炮兵营,由2—3个师编组的1个军理论上就拥有2个炮兵营甚至1个三营制的炮兵团所提供的火力;而按照卅一年加强编制改编的1个军,至多仅拥有1个炮兵营的火力,就数据而言不升反降。卅一年编制解决了国军过去编制中“虚”的问题,但未能解决“弱”的问题。

第二,部队改编卅一年编制时,国军高层过分强调改编进度而忽视了改编质量,从而使改编在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成为一种数字游戏。如第四十四军改编之前仅编有1个迫炮营,改编时也继续保持迫炮营的建制,并未将其升级为装备山炮或野炮的炮兵营。<sup>②</sup>第二十军改编之前,其骑兵仅为1个连,在新编制中仅仅更名为搜索连。<sup>③</sup>第四十二军改编为卅一年加强编制时,即“增设辎重兵团一,以本部及各师辎重兵营编成之,第一、二、三营为建制,第四营为战时增设,各师工兵营缩编为连,预七师野战医院并入军野战医院,军及各师野战医院赋予一至三番号”。<sup>④</sup>第六十军也与之类似,“军搜索连照原有骑兵排扩编成立之;迫炮营就原有充实之,工兵营以第一八二、四两师工兵营(除留一连为师工兵连)合编为二连制之军工兵营,通信兵营就原有通信兵营充实之,特务营就原有特务营充实之,辎重兵团照两营制人马编成,由各师辎重兵营扩编成立,输送连由军原有辎重兵连改编,第一野战医院由原有军医院改编,第二野战医院由原第一八二师野战医院改编,第三野战医院由原第一八四师野战医院改编”。<sup>⑤</sup>简而言之,改编过程中人员和装备并未得到补充,械弹和器材也没有因此升级,如此改编其实“换汤不换药”,部队战斗力的提升只能是空中楼阁。

第三,部队按照卅一年编制改编后,火力和资源集中至军一级,“军强师弱”的配置在实际作战中引发了新的矛盾。陈诚在1944年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中委婉地指出,部队的编制“宜富有弹性”,应该“视任务与情况”,随时随地分解组合,特别是部队的通讯、辎重单位更应如此。国军现有的编制以军为战略单位,“特种部队辎重部队及经理卫生等机关,统属于军部”,师一级单位实际

① 蒋介石:《西安军事会议讲评(二)》(1942年9月9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9卷,第260页。

② 《陆军第四十四军沿革略史》(1946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787/16787,第5页。

③ 《陆军第二十军历史概要》(1945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787/16784,第5页。

④ 《陆军第四十二军略史》(1942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787/16786,第6—7页。

⑤ 《陆军第六十军整训备战报告书》(1942年5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787/02608,第36—37页。

“无独立作战条件”，而很多时候，师仍在独立承担作战任务，“发生困难甚多”。<sup>①</sup>由此看来，师的配置被弱化后，无法单独遂行任务，影响了战斗力的发挥。

由于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1942年完成卅一年编制改编的国军部队作战能力并未提高，加上国军在情报、部署、指挥等方面频频出现失误，1944年豫湘桂的溃败也就在情理之中。<sup>②</sup>以蒋介石为首的国军高层在痛苦之余，开始着手军队改革，其要点涉及军纪、政工、官兵待遇、战术、军官素质、参谋指挥、士气、统帅部等多个方面。<sup>③</sup>在军队组织方面，7月在重庆黄山召开的整军会议正式做出了减少军师数量、压缩部队规模的“缩军”决定，这显然是一个重大变动。对于军队的编制，尽管如本文开头所述，陈诚、蒋介石都发现了诸多需要改进之处，但整军会议上对编制所做出的调整，则相对小得多。蒋介石认为现行的卅一年两种编制过于繁琐，决定以加强编制为蓝本，改“加强”为“修正”，将部队编制统一为修正卅一年军、师编制。<sup>④</sup>黄山整军会议后，全国军、师即准备按照此“修正”编制改编。1944年10月起，新一轮改编正式开始。<sup>⑤</sup>

就内容而言，修正卅一年编制同卅一年加强编制的区别并不大。有趣的是，修正卅一年编制恰是之前卅年加强编制的翻版。在军一级，原军属辎重团裁分为4个营，重新编为军辎重营及3个师辎重营；原3个野战医院之外另成立1个野战医院，改为军部及3个师的野战医院；此外，原军搜索营遭到裁撤。<sup>⑥</sup>在师一级，师属辎重、卫生单位于1942年被上调至军后，1944年又复归师建制，因而在师一级单位中，修正卅一年编制中恢复了师属辎重营和师野战医院，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大的变化，仅是师属搜索连被裁撤。<sup>⑦</sup>1944年的修正卅一年编制可以说是对1941年卅年加强编制的回归，矫正了1942年卅一年加强编制带来的“军强师弱”的弊病，但其编制配置较弱，改编流于形式的问题仍然存在。

由于修正的幅度并不大，因而各军、师的改编进度仍然如同1942年初那次调整一样迅速，多在一个月之内完成。如第一五一师，1944年“十二月奉命遵照修正三十一年陆军师编制表改编，师直属搜索连及直属机枪连裁撤，军部第二野战医院改为师野战医院，军辎重团第一营改为师属辎重兵营，其余师团营之连排仍旧，均于月底改编完毕”。<sup>⑧</sup>这样的改编仍近乎数字游戏，其进展顺利也在情理之中。至1945年初相持阶段临近结束时，国军120个军、354个师中的绝大多数按照此编制编成。<sup>⑨</sup>

#### 四、余论

从1939年初至1945年初的6年时间里，国军经历了廿七年、卅年、卅一年三种编制。这三种

① 陈诚：《电呈视察前方归来建议国军应行改革五事》（1944年11月上旬），何智霖编：《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下册，第588页。

② 参见王奇生《湖南会战：战时国军的作战能力》，《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88—308页。

③ 参见《蒋介石日记》（手稿），1944年6月17日“雪耻”；1944年7月3日“预定”。

④ 蒋介石：《对于整军各案训示》（1944年7月27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0卷，第458页。

⑤ 参见《第三战区参谋长三十三年定期报告书》（1945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787/02513，第122页；《第六战区各军师沿革简史册》（1945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787/16768，第3—15页。

⑥ 参见《陆军第四十四军沿革略史》（1946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787/16787，第8页。

⑦ 参见《陆军第十八军第十一师三十四年度参谋长报告书（作战部分）》（1945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787/02516，第39页。

⑧ 陆军整编第六十二师第一五一旅编：《本师简史》，《陆军第一五一师三十周年纪念特刊》，第19页。按，该师直属机枪连应是其自行编成的小单位，按照军政部的要求，自然在此次改编中裁撤。

⑨ “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国民革命建军史》第3部，“八年抗战与戡乱”（1），第248—249页。

编制的配置和具体编成情况,从组织架构的角度反映了相持阶段国军一线部队的基本情况。三种编制之间既有一定的传承关系,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其嬗变轨迹呈现为两条不同的发展曲线。一条曲线反映了部队编制与军队状况的关系:军、师编制越发展到后来,越贴近当时中国的实际,最初的廿七年编制严重脱离国情,另起炉灶的卅年编制开始贴近实际,而最后大规模推行的卅一年编制则是从国军客观情况出发的产物。另一条曲线则是说明部队编制与军队战斗力的关系:三种编制中军、师在人员、火力、资源等方面的配备,总体呈逐次递减弱化的趋势,部队理论上的战斗力确实“一代不如一代”,实战中表现出来的作战能力也是逐年下降。这两条并行不悖的曲线,构成了相持阶段国军编制艰难演进的基本轨迹。

相持阶段国军编制的发展之所以呈现如此轨迹,与很多因素相关。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国军武器来源日益枯竭,导致枪炮数量严重不足。众所周知,国军数百万部队所装备的武器中,其中的轻兵器如步枪、轻重机枪尚可自制,但以山炮、野炮、榴弹炮为代表的重武器大多依赖进口。在相持阶段国军的军援中,苏联提供的军火当属大宗,至1941年10月苏联停止供货时,实际到货的共计约5万支步枪、6000多挺机枪、近百门榴弹炮、100余门野炮、数百门战防炮和近百辆坦克,其规模已大于战前引进的德械。<sup>①</sup> 尽管如此,输入的苏械远远不能满足全军按照廿七年编制改编。

以军属炮兵营为例,按照廿七年编制设计,每军直属1个编有36门山炮或野炮的炮兵团,位于前线的100个军就需要3600门火炮。根据1940年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后来成为苏军元帅的崔可夫(В. И. Чуйков)在回忆录中记载,当时中国军队的大口径火炮(大于75毫米)有171门,中口径火炮(75毫米或76毫米)有997门,共计1168门。<sup>②</sup> 这1000多门火炮仅能满足1/3部队的需要,况且国军的火炮还得优先配备给十数个独立炮兵团使用,能够用于充实野战部队的少之又少。

随着1939年之后海上交通的断绝,国军的武器进口日益困难。1942年1月1日,美国对外军事援助的租借法案对中国生效,但在事实上,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军事上的突变和运输上的客观困难,在1944年年底之前国军实际接收的美国武器并不太多,美国提供的军火数量与中国的实际需要量存在巨大差距。<sup>③</sup> 1942年1—4月,中国需要的反坦克炮、山炮、步枪、手枪的数量分别为720、720、200000、45000,但美方供给量才60、44、20000、442。<sup>④</sup> 相持阶段的国军困于枪炮弹药的不足,原先采用的廿七年编制被配置较低的卅年、卅一年编制取代,当属情理之中。

另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国军一直努力尝试的“缩军”计划始终难产。在1939年至1941年的多数国军将领们眼中,面临国军“量大质劣”的困境,“精兵主义”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解决方案。倘若残破军、师被缩编或裁减,国军的总体规模得到控制甚至压缩,待部队总体数量减少后,来之不易的进口重武器可以得到重新分配,汰弱留强之后的“精兵”完全可以按照廿七年编制不打折扣、齐装满员地改编和充实。无奈国军的“缩军”计划因为诸多复杂的原因屡遭搁浅,至1941年9月,陈诚在给张治中的一封信中充分表达了对于此种情况的失望:“军队之数量日益庞杂,军费之支出日增无已,而素质日渐低落,在在适成反比例,处处感兵力之不够,考其原因,悉由整军之未能实现,反得扩军之结果也。”<sup>⑤</sup> 在“扩军之结果”下,唯有在廿七年编制基础上缩减配置而成的卅年两种编制才更

① 参见王正华《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台北,环球书局1987年版,第100—121页。

② 崔可夫著,赖铭传译:《在中国的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解放军出版社2012年版,第79页。

③ “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国民革命建军史》第3部,“八年抗战与戡乱”(2),第1456—1475页。

④ 王正华:《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第245页。

⑤ 陈诚:《电张治中整军为达成抗战胜利建军之不二法门》(1941年9月9日),何智霖编:《陈诚先生书信集——与友人书》上册,第194页。关于国军战时的“缩军”问题,参见陈默《难产的“缩军”:抗战相持阶段国军内部关于缩减兵额的论争》,“第一届抗日战争史青年学者研讨会”论文,杭州,2013年。

符合客观情况,也能够被大多数人接受。

1941年国军高层关于“缩军”的论争达到高潮,11月底蒋介石决心实施缩编计划,将全国的300余个师缩编为240个师。但在次年(1942年)按照《陆军各部队调整大纲》实施的整理中,“缩军”计划却实际流产,全国总兵力已经超过了500万大关。在如此条件下,只有各方面配置较卅年编制小幅缩减的卅一年编制才具有操作性。

卅一年编制中各级单位特别是特种兵科方面低水平的配置,说明1941年、1942年之交的国军高层,业已放弃了过去不断尝试的通过采用新编制提升部队战斗力的尝试。此刻他们所希望的,更多的可能是部队的编制可以符合当下的军费开支、武器供应、物资供给等客观实际。按照同样的逻辑,1944年国军修正卅一年编制的努力,也是基于依然捉襟见肘的客观条件的再调整,“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也就可以理解了。由此可见,“缩军”计划难产,的确是相持阶段三种编制配置逐次递减弱化的另一重要原因。

经过艰难的演进,国军的编制从1939年初的廿七年编制发展至1944年的修正卅一年编制,配备较之过去已逊色不少,其直接结果是国军战斗力不断下降。那么,按照修正卅一年编制编成的一个战略单位——军,与同时期日军的战略单位——师团,差距到底有多大?详见表4的对比。

表4 国军修正卅一年编制军、日军乙种师团、日军丙种师团编制对比表<sup>①</sup>

国军		日军		日军	
编 制 配 备	修正卅一年编制军	编 制 配 备	乙种师团	编 制 配 备	丙种师团
军属部队	步兵师3,炮、工、通、特、辎各1营	师团属部队	步兵联队3,炮、骑、工、辎各1联队,通1中队,装甲车1小队	师团属部队	步兵旅团2,炮2大队,骑、工、辎各1大队,通1中队
师属部队	步团3,辎1营,工、通、战防炮、特各1连	联队属部队	步大队3,联队炮、速射炮、机枪、工、通、辎、各1中队	旅团属部队	步大队4
团属部队	步营3,迫炮1连,通1排	大队属部队	步中队4,机枪1中队,大队炮1小队	大队属部队	步中队4,机枪1中队,大队炮1小队
营属部队	步连3,机枪1连	中队属部队	步小队3	中队属部队	步小队3
连属部队	步排3	小队属部队	步分队3	小队属部队	步分队3
排属部队	步班3,掷弹筒组1(2门)	分队构成	轻机枪组1,掷弹筒组1(2门),步枪兵8人	分队构成	轻机枪组1,掷弹筒组1(2门),步枪兵8人
班构成	轻机枪组1,步枪兵8人				

资料来源:《陆军第四十四军沿革史》(1946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787/16787,第8页;《陆军第十八军第十一师三十四年度参谋长报告书(作战部分)》(1945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787/02516,第39页;金亚生:《日寇陆军战略单位以下部队编制装备变革之研究》,《军事杂志》第151、152合期,1943年10月,第88—92页;A. J. Barker, *Japanese Army Handbook, 1939 - 1945* (London: Ian Allan Ltd, 1979), pp. 124 - 125. Philip Jowett, *The Japanese Army 1931 - 1945 (1)* (New York: Osprey Publishing Ltd, 2005), pp. 8 - 9. G. L. Rottman, *Japanese Infantryman, 1937 - 1945, Sword of the Empire* (New York: Osprey Publishing Ltd, 2005), p. 42.

<sup>①</sup> 按,关于日军乙种特别是丙种师团编制,不同史料及研究著作的记述略有差异。这部分缘于材料来源或统计方法不同,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各个名为“丙种”的师团之实际编成存在差异,不排除一些丙种师团并未配备炮兵大队和骑兵大队。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陆续将编制过大、调动不便的二旅团四联队制甲种师团调整为三联队制的乙种师团,其最大的变化就是裁撤2个旅团部和1个步兵联队,剩余的3个步兵联队由师团直辖,其余特种兵科基本保持不变。<sup>①</sup>同作为战场上的主力,国军按照修正卅一年编制编成的军相对于乙种师团,在配置上全面处于劣势。国军1个军在人数上占优,但军属特种兵科仅为营级规模,而乙种师团直属的炮、骑、工、辎部队均为联队级别,这意味着后者在火力、机动、土工作业、输送方面的能力是前者的三倍以上;国军1个师人数大概是日军1个步兵联队的两倍多,但直属特种兵科的实力仍然不如日军的联队所属的炮、工、通、辎部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拼凑出相当数量的丙种师团,主要用于中国战场的反游击作战。丙种师团由2个步兵旅团组成,旅团之下不设联队一级,仅直辖4个步兵大队,而特种兵科方面较乙种师团已是损之又损。<sup>②</sup>即便如此,国军1个军在1个丙种师团面前仍难占到上风。国军1个军虽然在人数上能够压倒对方,但在火力和后勤方面依然处于劣势;国军1个师比丙种师团所辖的步兵旅团的配置健全,具有一定优势;国军1个团对比日军1个步兵大队,人数上占优,而在火力上互有长短。

总而言之,进入相持阶段后,国军的武器来源日益枯竭,经年累月讨论的“缩军”方案又得不到落实。其结果只能是武器越战越少,官兵越打越多,“粥少僧多”的现实迫使国军不断降低编制标准,以求将稀缺的战争资源相对平均地分配给每一个军、师,统帅部所制订的编制与部队的客观实际日趋吻合,但按照此种编制改编的部队,其战斗力与日军差距越拉越大,仅能凭借数量优势维持敌我双方的战线,根本无法抵挡日方优势兵力的攻击。

幸运的是,在相持阶段临近结束的时候,一些重大的利好因素开始出现,预示着国军的编制情况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将触底反弹。根据1944年7月黄山整军会议上蒋介石的指示,总数将近650万的国军部队,于1945年初“经极力压缩,为五百七十余万(含机关学校员额在内)”<sup>③</sup>,延宕多年的“缩军”计划终于开始启动。更重要的是,1945年1月27日,远征军与驻印军在芒友胜利会师,中印公路完全打通,长期积压在印度和刚从美国舶来的各类轻重武器开始陆续运到国军手中,这之后数月源源不断运进中国的美械,其数量和质量都超过以往的德械和苏械。

如此有利的环境之下,国军于短短数月内根据美援的情况,参酌驻印军和远征军的架构,拟定了新的编制——卅四年编制,并于1945年在较大的范围内进行推广。此后,抗战相持阶段出台的最后一个编制——修正卅一年编制寿终正寝,迅速而黯然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作者陈默,四川博物院馆员]

(责任编辑:徐志民)

<sup>①</sup> 参见徐平主编《侵华日军通览》,解放军出版社2012年版,第88—89页。

<sup>②</sup> Philip Jowett, *The Japanese Army 1931-1945 (I)*, p. 9.

<sup>③</sup> 何应钦:《军政十五年》,第58页;何应钦:《对六届全国代表大会军事报告(自民国三十三年五月至民国三十四年五月)》,浙江省历史学会现代史资料组编:《抗日战争军事报告集》(下),第270页。